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0)01-0040-06

论萧萑父的“道家风骨”

刘建平

[摘要] 萧萑父对“道家风骨”的现代诠释,正应合了他所力主的“早期启蒙说”。从生活层面上看,“道家风骨”体现为一种隐逸、包容的达观气度;从思想层面上看,表现为一种独立于权威和主流之外的异端思想;从政治层面上看,表现为一种刚正不阿、反专制的批判精神。萧萑父对道家思想这一性格的揭示,顺应了世界范围内民主改革的时代潮流,也代表着人类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宽容的价值取向,在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道家风骨;异端思想;早期启蒙说

[中图分类号] B26 [文献标识码] A

萧萑父先生先以王夫之研究专家名世,后以对中国哲学史的梳理而奠定了在国际哲学界的地位。他的治学方法是在杂多中求统一,从矛盾中观其会通,正如郭齐勇教授所言,萧萑父综合了儒之清刚、道之飘逸和禅之机趣,追求真善美合一之境^①(第48页)。尤其是他对道家思想的现代诠释,独开慧眼,别具一格,在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论:“道家风骨”的文化渊源

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转型幅度最大、思想冲突最为激烈的一段时期,随着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思想的自由解放、政治民主化也成为时代的发展潮流。萧萑父在《吹沙集》之《道家·隐者·思想异端》篇中首先提出了“道家风骨”这一名词,从1984年到1996年,他写了《秦汉新道家》(1984)、《道家·隐者·思想异端》(1989)、《“道家(道教)文化与当代文化建设”学术讨论会开幕词》(1990)、《道家风骨:被竭怀玉的异端性格》(1992)、《道家风骨:道法自然的客观视角》(1992)、《道家风骨:物论可齐的包容精神》(1992)、《道家论“体知”》(1996)、《道家方法论》(1996)、《道家的文化心态》(1996)等论文,详尽而系统地阐述了道家思想的来源、个性、方法论及文化价值^①。如果说他与李锦全合写的《中国哲学史》以及《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中对道家思想主要侧重于史料的梳理和考证而忽略了内在思想的挖掘和诠释的话,那么以上这些论文,可以看作是他对道家思想的深入思考。

自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有名的“风骨论”后,“风骨”似乎成为中华民族刚健、辉光、笃实的精神写照。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中,“风骨”恰恰是儒家“大丈夫”人格的写照,至少是先秦儒家的精神,这怎么会成为道家的精神呢?萧萑父之提出“道家风骨”,我认为其思想渊源有二。一是从中国哲学思想史发展的视角看,儒家思想的根基是由宗法伦理关系及其所产生的宗法伦理意识,通过宗法家庭的道德行为规范而推广到宗法等级制的礼教,由此而“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它从伦理实践的角度肯定了人作为主体的道德自觉的责任,代表着人文精神的觉醒。然而,秦汉之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政治变革的需要,秦汉新儒家摄取阴阳,融合法家,尤其是董仲舒吸收了韩非子的

“三纲”思想建立起的“杂霸、王道用之”的新政治思想,使得宗法伦理由相互的道德情感变成了强制的行为规范,变成了日益丧失了主体道德自觉的异化教条,儒家所赖以生存的血缘纽带和宗法秩序成为扼杀人性的枷锁,这就是萧蓬父所说的“伦理异化”,他引用王夫之的“后世之天下死于申韩之儒者,积焉”,以及谭嗣同的“数千年来三纲五常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儒法合流的专制本质^[2](第154页),儒家由对人文价值的褒扬走向了主体的坎陷和道德的异化,人的真正价值被否定了。

从儒家思想本身的性格来看,儒家经世致用的特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使得它从来就不是一门单纯的思想学派,而是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行动纲领,这便导致了儒家在历史上治统与学统、政统与道统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儒家精神为专制统治提供了精神和制度建构上的支持,“(儒学)通过对社会意识的清洗、过滤、分解、消化,使之转化成养体表、润肺腑的营卫之气,维持着专制王权的内在生机”^[3](第327-376页)。另一方面,专制统治又极大地改变了儒学的性格,儒家在长期的专制暴政统治下,日益沦落变异为专制的附庸,从“大丈夫”蜕化为“软体动物”。徐复观对专制政治的这种消极作用认识得尤为深刻,“儒家精神,是浸透滋荣于社会之中,而委屈摧抑于专制之下,政治对儒家精神的正面作用,远不及其反面作用之大。”^[4](第51页)这种貌似中庸的“骑墙”姿态使儒学一方面可以成为粉饰太平、宣扬统治、树立形象的宣传工具,另一方面又成为在“天理”的名义下大兴文字狱、摧残民主自由思想、杀人于无形的利器,戴震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淫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5](第188页)这使得儒学日益变得封闭和狭隘,在专制政治的拉拢和高压下,后世儒者不是沉溺于章句、科举、八股,就是醉心于利禄、文人情调,成为专制政治的帮凶和牺牲品。正是在对历史上“儒法由相乖而合流”、“道法由相依而分驰”的事实梳理和辨析的基础上,萧蓬父发现了先秦儒家失落的真精神,却在道家思想中得以维系千年不坠。传统意义上,人们总把道家贴上“避世者”、“失败者”的标签,这一方面是因为道家的人物大多喜欢离群索居,有林泉之致,不易为人们所了解,如道家的开山人物老子,司马迁以“老子,隐君子也”(《史记·老子列传》)的断语给道家打上了退隐避世的烙印。另一方面,很多儒家知识分子在残酷的政治漩涡中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他们以在野的姿态退隐山林,有的看破红尘,以诗酒自娱,自愿“蝉蜕嚣埃之中,自致寰区之外”(《后汉书·逸民列传·叙》);有的与现实的权力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通过文字“非汤武而薄周孔”、“越明教而任自然”,成为时代思想的异端和正义、良知的象征,这就是萧蓬父所说的“他们退隐在野,贵己养生,不慕荣利,乃至傲视王侯因而有可能较多的接触社会现实,了解民间疾苦,关心生产科学,乃至成为时代忧患意识、社会批判意识的承担者,或‘以德抗权、以道抑尊’的代表人物。”^[2](第152页)萧蓬父所欣赏的,正是后一种精神,他将之提炼为“道家风骨”。

萧蓬父提出“道家风骨”的第二个思想渊源是港台新儒学思潮的影响。现代新儒家主要从两个层面进行传统文化的“推陈出新”工作:一是从思想层面上,主张回到先秦的儒家和道家,还其历史真面目;二是在政治层面上,主要思考的是传统文化如何同现代的民主政治接轨的问题,这也正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和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潮流相互激荡的一个焦点,萧蓬父对“道家风骨”的诠释也基本上是从以上两点出发的^②。萧蓬父在20世纪80年代和刘述先、成中英、傅伟勋、杜维明有过多次接触,如1986年10月,萧蓬父与刘述先一起参加在宁波举行的“黄宗羲国际学术研讨会”,二人曾就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问题多次交谈^[6](第143页);萧蓬父与傅伟勋有过多次书信往来,傅伟勋曾特别提到萧蓬父的《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与《关于改革的历史沉思》两文所提出的“哲学启蒙说”,认为这代表了一种新的思潮^③。历史上的儒家,除了完全依附于专制统治的腐儒、奴儒之外,大多是彻底现实的理想主义者^[6](第160页),是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主义者,“儒家传统优点是在不同时代保持其生命力和适宜性,不过儒家本身有足够的广度,能容纳不同政见的人士,有保守派、中间派、激进派”^[7](第63-64页),这是不容抹杀的历史事实。只不过,儒家的这种性格,在后世大多是以“伏流”的形式隐而不显,不如道家对中国文化的这一精神明加彰显与表出罢了。萧蓬父对“道家风骨”的诠释,并非空穴来风,他以道家哲学来言个人之志向,以文本为依据,并通过历史事实加以验证,这也正应合了他所力主的“早期启蒙说”“在西化派,言必称希腊”与国粹派,言必称孔子”的交相鼓噪下人们必须排除干扰,探寻

自己民族传统文化中“破块启蒙, 灿然皆有”的活水源头。”^[8] (第 38 页) 早期启蒙思想即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 其体用自然是内在统一的^[9] (第 55 页), 这表明中国文化主体并不是一个僵化不变的主体, 而是历史地更新着的。萧蓬父对道家思想这种异端性格的发掘, 是其思想中最富有个性和光华的一页。

二论: “道家风骨”的哲学内涵

萧蓬父的“道家风骨”包含着丰富和开放的意蕴。从整体上来看, 我认为其内涵大致可以归结到三个层面: 从生活层面上看, 体现为一种隐逸、包容的达观气度; 从思想层面上看, 表现为一种独立于权威和主流之外的异端思想; 从政治层面上看, 表现为一种刚正不阿、反专制的批判精神。

从生活层面来看, 人们在谈论道家人物时喜用“仙风道骨”这四个字, 这代表的是一种“遗世而独立”的隐逸姿态。萧蓬父认为, 道、法背道而驰后, 道家隐者们的言行和他们在各个文化领域中的创造活动, 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与历代庙堂文化相并立或对峙的山林文化传统, “他们既具有博古通今的历史教养, 又与现实权力斗争保持一定距离, 因而有可能深观社会矛盾运动, 冷静分析和总结历史经验。”^[2] (第 153-154 页) 值得注意的是, 萧蓬父在这里把道家的隐者作为一个与当权者相对应的团体来看待, 实颇有范仲淹之“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的意味。隐士们的隐居生存形态似乎是孕育“道家风骨”的现实土壤, 而历史上“隐逸”与“风骨”的涵义又似乎有着相当的距离——隐逸通常被看作是消极的处世态度, 如叶适曾谓庄子乃“以养生送死饥渴饮之大节, 而付之恣荡不羁之人”^[10] (第 197 页)。这个评价是有失偏颇的, 与助纣为虐鱼肉百姓或在专制统治下苟且偷生相比, 洁身自好、置身肮脏污浊之外的“隐逸”姿态究竟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还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无声抗议呢? 这个问题的争议也牵涉到对庄子的理解, 我比较赞同钱穆的意见, “庄周的心情, 初看象悲观, 其实是乐天的。初看象淡漠, 其实是诚恳的。初看象荒唐, 其实是平实的。初看象恣纵, 其实是单纯的。”^[11] (第 11 页) 道家的真性情往往被文明的面纱给遮蔽了, “逸士之出世, 未必是本性如此。它其实是对文明弊端的反拨。”^[12] (第 5 页) 事实上, 从历史上看, 山林与庙堂、山林民间文化与庙堂贵族文化并非截然分离绝缘, 而是不断地相互流动和转化的。隐逸一方面代表着道法自然的人生态度, 另一方面也是启蒙个体觉悟甚至代表着社会新生力量的精神象征, 这是“道家风骨”的第一层涵义。但萧蓬父意不在此, 而是更侧重“道家风骨”以下两方面意蕴的发掘。

李约瑟曾言, 中国文化的大树, 道家是其根, 这显然是从科学的角度而言的。落实在文化和思想上, 则儒家无疑是正统, 是主流, 历史上无论是儒、法合流, 还是儒、道合流, 都是以儒家为主导, 这是无可争议的。儒、道、禅之间的对立、互补和移换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得如此自然而频繁, 这是世界文化中一个少见而值得回味的现象。萧蓬父也注意到了儒道之间既对立又互补的关系, “正如西方文化中有‘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对立和互补一样, 中国文化主流中也有儒、道精神的对立和互补。”^[2] (第 152 页) 然而, 萧蓬父认为道家有自己特殊的性格, 那就是独立于权威和主流之外的异端思想, “道家以其被罢黜、受排斥的现实遭遇, 更以其固执天道自然、抗议伦理异化的理论趋向, 便一直被视为思想异端。”^[3] (第 161 页) 这种试图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尊严的处世态度发端于庄子, 历史上关于庄子的人格和性情记载极少, 然“王公大人不能器之”的姿态人所共知。《史记·老庄韩非列传》记载了楚威王使使厚币迎庄子的故事, “楚威王闻庄贤, 使使厚币迎之, 许以为相, 庄周笑谓楚使者曰: ‘千金, 重利; 卿相, 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 养食以数岁, 衣以文绣, 以入大庙, 当时之时, 虽欲为孤豚, 岂可得乎? 子亟去, 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 无为有国者所羁, 终身不仕, 以快吾志焉。’”在《庄子》之《列御寇》、《秋水》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③。无论是牺牛还是神龟, 庄子傲视王侯、嶙峋风骨的冰洁之姿, 跃然纸上; 虽有两千年时光之阻隔, 犹在眼前! 这就是萧蓬父所大加标举的“道家风骨”之真精神。

现代诠释学认为, 诠释只有走向极端才有趣^[13] (第 112 页)。当然, 它并非鼓励一种妄想狂式的漫无边际的“戏说”式的诠释, 而是认为, 极端的思想往往也是最具生命力和创造性的思想。道家的异端性格在思维方式上体现为一种逆反思维, “作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 逆反思维至少具备求异性、批判性等重要特点。庄学思想正是运用了这些思维武器反对常识, 反对传统, 反对世俗, 而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独特

的理论。”^[14] (第156页)历史上道家屡屡在民族存亡绝续之际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汉初,道家因能“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俱迁,应物变化,力俗施事,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而成就了“文景之治”;魏晋时期,正是因为道家思想的渗透,而后有了玄学的勃兴;五代至宋,也是因为道家、佛学与儒家相互融合,而有了宋代理学的产生。如果说,徐复观写《中国艺术精神》是从美学和艺术史的角度对道家的这种异端思想的现代价值予以发掘的话,那么萧蓬父则是从哲学的角度明确提出了这一概念并详细论述的第一人,它体现了对个体生命存在的独特性、多样性、人文性和精神性的尊重,并提醒我们注意道家思想的这一精神特质对个性解放、思想去蔽和反异化方面的历史作用和现代价值。

“道家风骨”的第三层涵义就是面对专制和霸权所表现出的刚正不阿的抗议精神和反专制的批判立场。萧蓬父认为传统是多维的,道家也是多维的,不可单一化地理解,“诠释的多样性不排斥诠释的对象仍有其历史的统一性”^[2] (第135页)。庄子之为庄子,有“隐逸式的庄子”,也有“批判式的庄子”,还有“沉重的庄子”,岂可狭隘地窄化为不理世事的消极形态呢?庄子的鲲鹏的寓言反映了庄子哲学追求精神自由的基本趋向,寄托了庄子的人生理想。这种趋向体现在思想上,表现为批儒讽墨的异端立场,对主流的价值观念和权威进行无情的批判和彻底的解构;体现在政治上,则表现为一种“不合作”的姿态,“天子所不得臣,诸侯所不得友”(《后汉书·逸民列传》),即不受任何组织和权力的控制,“(他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他们的议政,是‘不治而议论’,只是‘各著书言治乱之事’,并不希图进入政治权力结构,反而力求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因而能够表现某种‘以德抗权,以道抑尊’的精神。”^[2] (第155页)需要指出的是,庄子的这种姿态其实与道家全身、保生的思想是矛盾的,这种视权贵于无物的超然态度和孤傲气节往往会激怒专制统治者,从而招致自身的灾祸,韩非子对此就说:“赏之誉之不动,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其除之。”(《韩非子·外储说石上》)显然,这种不受官爵赏誉,不惧刑罚罪祸,不与统治者合作的高傲态度,不仅不为统治者所不容,而且也和自己保生的思想主旨相悖。既然如此,庄子为何还要执著如此呢?庄子之所以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他在朝不保夕、死无葬地的乱世,心中还燃烧着自由生命的激情;在面对人世的忧患时,依然保有“吾独何能无慨”的责任感吧!这份激情和责任感使得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在儒学日益腐化沦落为专制的附庸、儒生在专制暴政面前日益变异为“软体动物”^[4] (第333页)的情况下,张扬了一种人间正气尚存的铮铮傲骨!刘纲纪认为,“历来被人看作混世主义、滑头主义的道家,其实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无所顾忌的批判精神……它在一定程度上同主张个性解放的思想结合起来了。”^[15] (第332-333页)道家的抗议精神和批判立场正是知识分子与专制意识自觉相抗衡的有效手段,萧蓬父对道家抗议精神的揭示,虽然是感时而发,但却超越了个人私心夹杂、超越时代的界限而具有永恒的意义。

三论:“道家风骨”的现代意义

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一直在儒学独尊或儒道释互补这种大锅饭式的模式中徘徊,对道家、佛学自身思想个性的研究和发掘在深度上显得很不够,很不充分,萧蓬父在这方面做了很重要的开创性的尝试。

首先,对“道家风骨”反专制、追求民主的独特性格的揭示,顺应了世界范围内民主改革的时代潮流,也代表着人类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包容的价值取向。历史上封闭、愚昧和专制的社会形态,终究要为自由、民主和开放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萧蓬父对“道家风骨”这方面内涵的揭示,无疑是大有深意的。中国历代的学说流派,大多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为治国平天下立言的,很少有道家这样站在民间的立场,以独立的人格和超越功利和世俗的眼光对时局发言,为生民立命,这对于我们民主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对治”意味,“过去的儒家对于国家大事,总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想由‘格君心之非’而督促他实施仁政,却欠缺站在被统治者的立场,来组织压力团体,以争取仁政的实施。因此,政治主体始终没有建立起来。”^[4] (第16页)没有异端思想存在的社会,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只有先有思想的异端,才能建立思想的民主,只有先有有批判精神的民间组织和民间力量的存在,政治上的民主才能成为可能,“今日

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有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尽其所能地就社会基本问题发表意见,对随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表态,他们的观点和态度对舆论的形成与走向,以及对公共生活的气氛产生影响,有时甚至对政府政策的形成发挥作用。”^[16](第 4 页)“道家风骨”作为民主力量对专制统治的抑制和社会进步的努力,是需要被重新认识的;道家在历史上的这种贡献,是值得我们肯定的^①。“道家风骨”的反人格异化、反专制、追求自由民主的异端思想,正是我们进行民主体制改革的重要精神资源。

其次,“道家风骨”对现代文明危机的化解有着重要的启示。20 世纪是科学神话破灭的世纪,人类在创造了现代物质文明高速增长神话的同时,也面临着精神日益贫乏的危机;人类在利用科学技术无止境地开发自然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处在对自然警示性的惩罚的恐惧之中。对人和自然关系问题的思考,人类其实早在几千年前就开始了;而对科学危机的反思,则无疑始于现代文明的危机。现代科学的发展既创造了美,又破坏了美赖以存在的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导致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人们精神的虚无化和价值的单一化。现代文明扼杀了自然再生的可能性,也使人与自然之间生命的连续性中断了;它不仅破坏了自然的生态,也解构了人类充满诗意和想象力的文化生态。先秦时代,虽然没有现代性的危机,但是道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却涉及到了追求自身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生存状态这个现代性危机最核心的实质。“从贵己养生,全性保真出发,道家更强调了自然和人之间、宇宙大生命与个体小生命之间的同构与互动的关系,诱导人们从自然哲学转向生命哲学。”^[17](第 49 页)徐复观也认为道家由世俗超越而向自然,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保持精神的纯洁,恢复生命的疲困,能使观者内省其本性,使人的生命由此而得到充实。

现代性更重要的破坏在思想方面,它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摧毁了多样化的文化生存存在的可能性。如果说,儒家和两千年的封建专制逃脱不了干系,那么 20 世纪的极权统治和现代文明之间,难道就没有一点联系么?道家相比儒家的“力辟杨墨”之褊狭以及法家的“禁染反之学”之专断的文化心态,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前瞻性,“道家影响下形成的稷下学风,在学宫中各家各派可以并行不悖,自由辩论,兼容并包,互有采获,成为古代学术繁荣最光辉的一页。”^[17](第 50 页)作为传统思想资源中重要的一元,道家在近代以来远承历史上的异端性格,开拓出了思想解放的启蒙思想^②,体现了其连接古今、会通中西的广阔胸怀,“道家风骨”是重塑人类新精神、重建人类新秩序、实现和平与对话的重要基础。

另外,“道家风骨”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具有积极的时代价值。萧蓬父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中谈到,在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对立营垒之间,还有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这就是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型。在 20 世纪轰轰烈烈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化的呐喊声中,现代新儒家人才辈出,新佛家也是大师云集,而新道家则无疑是缺席的,门庭冷落,这种“儒热道冷”^[2](第 192 页)的局面依然是两千年来文化格局的再现。萧蓬父特别强调了中国历史上道家之异端性格在发展科学、文艺和哲学思辨方面作出的超迈儒家的独特贡献,并成为古代中国向近现代转向的精神发动机,“活跃于整个中世纪的思想异端,开始蜕化为力图冲决罗网,走出中世纪的新的启蒙意识。”^[2](第 165 页)新道家应该在 21 世纪中国文化的开陈出新和现代转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必须要有有创发性的突破,这种突破,涵盖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要深入中国历史的核心、根源,把中国的思想、经验、智慧挖掘出来,另一方面是“必须把我们的哲学智慧和精神贯注于现代人的生活之中,实际的解决现代人所面临的无根无向的困扰,解决现代社会中专业化和机械化的种种问题……并使它具有可行性的现代意义”^[18](第 348 页)。萧蓬父对“道家风骨”的现代诠释,体现了他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融合中西文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注 释:

① 这些文章大多收录在《吹沙纪程》一书中。除了以上文章外,萧蓬父还与罗炽主编了《众妙之门——道教文化之谜探微》(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另有《隋唐道教理论化建设》、《〈帛书老子校注析〉题辞》、《黄老帛书哲学浅论》等文。

- ② 萧蓬父说:“从文化的角度看,世界华人过去和现在始终面临着东西(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古今(传统观念和现代意识)之间文化思潮的矛盾冲突,面临着如何正确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的课题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补交融的难题。”见萧蓬父:《“文化中国”的未来与文化包容意识》,载《吹沙纪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77页。
- ③ 在《大陆学者的文化再探讨评析》一文中,傅先生指出:“根据我个人的亲身经验,在中国大陆各大学哲学系之中具有开放精神的,为数不多,武汉大学哲学系算是其中一个。譬如该系资深教授萧蓬父在《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与《关于改革的历史反思》这两篇文章里,提出一种‘哲学启蒙说’,有别于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说与具有‘中体西用’倾向的‘儒学复兴’说,认为应当继承17世纪兴起的批评宋明理学的早期启蒙思潮,自觉地更深广地有选择地吸取消化外来文化,完成近代哲学启蒙的补课任务……萧氏的‘哲学启蒙说’在思想改革与教育改革这一点,似较中西文化体用问题的论辩更有启迪作用,值得进一步探讨。”载傅伟勋:《大陆学者的文化再探讨评析》,载《“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版,第350页。
- ④ 《列御寇》篇云:“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秋水》篇云:“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以上三者记载略有差异,然其旨一也。
- ⑤ 道家的这种反专制、反异化的性格,宗白华可能是20世纪中国学界此一观念的最先表出者,他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称之为“天真真爱的赤子之心”;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对此种精神亦多有揭示:“‘以天下为沉浊’,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精神,这是一体的两面。而在‘以天下为沉浊’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精神中,实含有至大至刚之气,以为从沉浊中解脱而超升向‘天地精神’的力量。”后来李泽厚、刘纲纪在《中国美学史》中也从反异化的层面上对此进行了揭示。从时间上看,萧蓬父则是将道家的这种精神名之为“道家风骨”并展开系统论述的第一人。
- ⑥ 萧蓬父以傅山为例,认为他是继承道家异端思想、摆脱封建囚缚而转化为早期启蒙者的典型人物,见《道家·隐者·思想异端》,载《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166页;又详见《傅山三百周年祭》,载《吹沙集》,第304-312页。

[参 考 文 献]

- [1] 郭齐勇:《史惠欲承章氏学,诗魂难扫璵人愁——萧蓬父教授学述》,载萧汉明、郭齐勇:《不尽长江滚滚来——中国文化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
- [2] 萧蓬父:《道家·隐者·思想异端》,载《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版。
- [3] 李宪堂:《先秦儒家的专制主义精神——对话新儒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4] 徐复观:《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载萧欣义:《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
- [5] 《与某书》,载《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 [6] 刘述先:《传统与现代的探索》,台北:正中书局1995年版。
- [7] 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吴华译,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版。
- [8] 《萧蓬父文选》下,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 [9] 萧蓬父:《吹沙三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版。
- [10] 陈传良、叶适、真德秀:《止斋题跋,水心题跋,西山题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 [11] 钱穆:《庄老通辨》,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
- [12] 张节末:《狂与逸》,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 [13] 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柯里尼编,王宇根译,香港:牛津大学(香港)出版社1995年版。
- [14] 张岱年、成中英等:《中国思维偏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 [15] 刘纲纪:《美学与哲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 [16] 徐友渔:《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载《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4期。
- [17] 萧蓬父:《道家风骨:道法自然的客观视角》,载《吹沙纪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 [18] 成中英:《论中西哲学精神》,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1年版。